

# 学者写小说，变革还是回归？

“跨界”一词是新世纪以来文化领域的热门词汇，它包含着个人兴趣与能力的多重呈现、对身份的突破、对思维方式和工作模式的持续改变，同时跨界也遭遇到了专业层面的质疑。较为典型的跨界是文学与艺术、影视；文学领域内，评论家跨界至创作领域也不断出现。栏目主持人李黎与苏州大学教授、小说家房伟就此展开对谈。

对  
话

## 1

**李黎：**最近几年你突然以小说家身份在工作，《猎舌师》《血色莫扎特》两部作品广受好评，据说《石头城》也已经完成即将问世。从学者、教授、评论家等身份转为小说家，这一步你是怎么迈出来的？

**房伟：**我的文学创作生涯其实很早就开始了，最早发表文学作品是在高中时期，读大学时发表了很多诗歌、小说。读研究生后，学术工作压力大，我写得就比较少了，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其间也写过一些文学作品，总量比较少。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出版于2012年，也是前一阶段创作的一个总结。2016年，我来到苏州大学。江南文气充沛，江苏更是文学大省，对文学扶持力度很大，这些都激活了我的创作灵感。感谢苏州良好的文学创作氛围，也感谢江苏各级领导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从短篇开笔，先写了“猎舌师”系列中短篇历史小说，又写了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小说《血色莫扎特》，南京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石头城》等，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和擅长的题材领域。我觉得，我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是一种“激活”的状态。我多年的创作思维，被一步步激发出来。其实这也不能说“转变”，我的学术工作也一直在进行，还要写论文、出书，现在高校也还是以学术衡量教师。2021年，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和苏州大学出版社各出版了一部学术专著。

**李黎：**从你目前这三部作品看，你的小说写作更多是针对外界的、他人的，大事件乃至大历史的，其中抗日战争历史你介入了很多，也非常深，可能会自成一家。同时你的小说创作没有围绕个人经历、内心来写，没有呈现出高度个人化的因素——一般而言很多学者、评论家的小说往往是这样，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挥之不去的题材或情感。但你摆脱了这个相对固定的模式，显得更加职业化、显得是蓄谋已久。这是你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因此有一种宏观视野的结果，还是纯粹的个人兴趣爱好？

**房伟：**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有着很多我个人生活的影子与印记。这部长篇小说今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再版。它标识着很多我个人的体验和感悟，虽然今天看，还有些粗糙，但也有着一股青春的热情。不过，我想，好的作家，还应该是一个“存在的探究者”，他应该从自我出发，展现自我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体验。这也与我的文学批评理念有一定联系。我觉得要反思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化写作风格，它在丰富了我们的言说维度的同时，也削弱了我们和世界的联系——特别是在当代小说遭到了网络文学和影视传媒的多重挑战的今天，重建自我与文学与历史的联系，与现实的联系，一方面能让文学获得更广泛人群的共鸣与认同；另一方面，也能让我们的文学创作，获得新的灵感和更多表现空间。毕竟，文学是求新求变的艺术，创作必须对时代有准确表现，才能真正表现出“个性自我”的主体性与阔大的一

面。我对历史创作领域感兴趣，也对现实主义题材有着感应。我想，创作也应该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自由”地反映自我，另一方面，也要对“自我”的局限性抱有警惕之心，特别是小心那些以自我的名义，封闭心灵，沉溺于虚无情绪中的做法。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好的作家和作品，总是在准确地“击中”时代之后，才能唤醒这个时代中无数个“自我”的共鸣。我个人的创作兴趣比较广泛，对现代主义不排斥，也不想受到某种风格或流派的束缚，还是随着自己的兴趣走，“独创性”肯定是第一位的，搞创作就一定要写出新颖别致的、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 2

**李黎：**从《风景的诱惑》等批评著作，到著名的《王小波传》这样的传记，再到《猎舌师》《血色莫扎特》，你的身份一直在悄然变化，也是越来越复杂。从最早纯粹的学者、青年教授，到后来有些作家色彩的学者，再到如今的著名小说家同时被淡忘了学者身份，这个变化是你想要的，还是自然发生的？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你的重点在哪个领域？

**房伟：**我想还是顺其自然吧！我这个人有些散漫，不喜欢被束缚得太多，也对身份感不太敏感。而当下的学术体制，就是鼓励学者在评奖、论文、课题、著作这个“四角笼”里打转，最好学术方向也不要变，一辈子研究一个领域，这都是有问题。我今年出版的《新世纪文学的批评维度》和《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宏大叙事问题研究》，主要还是针对纯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领域的一些问题的学术研究。这主要是对我前些年研究的总结。我这两年更多关注网络文学领域，我觉得这个领域生机勃勃，有很多新的现象、新的作家和新的问题，而且网络文学研究，也可以延伸到通俗文学与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今后我也会在网络文学这个方面有更多努力。学术研究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我在高校教书育人的根本，我不会放弃。当然，小说创作也是随着兴趣走，有了灵感和冲动，也会继续写下去。

**李黎：**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学者都从事小说或者诗歌的创作，例如王尧、张柠等诸位老师。或者说可以这样说，做研究的人、做批评的人，始终在强忍着创作冲动，始终在批评家的身份界定和投身创作的激情之间平衡，但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忍不住了，亲自上阵。你是不是也长期处于这样的境地？怎么看待学者投身创作这件事？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对创作而言有什么利弊？

**房伟：**王尧与张柠两位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都能做到在学术研究与创作之间游刃有余。我在这方面有很多烦恼和痛苦，有时候的确感觉想干的事情多，想写小说，想搞研究，也想读古书，但精力实在有限，能力也有所不逮。其实，在民国时期，很多学者都是既搞研究又搞创作，比如，鲁迅与周作人，钱钟书、俞平伯、陈梦家等。可能这还要看作者在哪一时期的写作冲动更强。创作冲动多，可能写作品多些，研究的冲动多，可能搞

学术多些。读严肃的学术著作，能让人增长智慧，而阅读文学作品，则让人受到广阔的“生命的浸润”。但没有办法，现在的大学体制，对学者的限制太多，这也扼制了学者的文学创作冲动。学术和创作，也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学术研究，语言要朴素准确，问题意识强，清晰理性，创作上则要求千变万化，求新求变，出奇制胜，是想象力的艺术。作家可以化身狂徒，也可以是冷静的旁观者。当然，研究思路，有时会影响创作，比如，鲁迅冷峻理性的学术风格，影响了他的小说表达。也有毫不相干的例子，比如，陈梦家是一个个性浪漫的诗人，然而他的学术研究《殷墟卜辞综述》等，非常严谨枯燥。清代“同光体”诗人、学者陈衍说过，“肯并学人与词客，何难出笔雅兼风”，意思是兼顾学者的理性与创作的感性，但这是一个很难的境界，也是一种尺度的拿捏，如果做不好，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搞创作想着反映深刻的学术思想，搞研究要有很多文采，就会变成钱钟书先生批评的“学人诗”的弊病了。具体文本之中，作为隐含作者的一面，作家总要表现出合适的文体感和不同的创作倾向。

我想，创作界和研究界对学者写小说，也应该持有比较宽容和放松的姿态，目前在海外，大江健三郎等作家也都有着学者身份。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大学教授写小说，搞创作的人也很多。将来的中国大学，也应该鼓励学者，特别是研究文学的学者，可以搞些创作，从大的方面讲，有利于文科教学和文学毕业生的出路；从小的方面讲，可以将创作的感性灵活的东西带到大学讲堂，这无疑是非常有好处的。可惜的是，目前的大学体制内，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着很多争议。这也导致了我们这些“搞创作的学者”的尴尬——总觉得有些有些不务正业。

## 3

**李黎：**《石头城》之后，还有什么强烈感兴趣的小说写作题材？

**房伟：**在小说创作上，我这几年零零散散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从题材上说，也有着类型的集合性，比如，文人之死系列小说、高校知识分子系列等，有的写了六七篇，有的写了四五篇，将来会慢慢把计划中的那些小说，一点点地写出来。至于长篇小说，《英雄时代》与《血色莫扎特》是“九零年代”系列的前两部，计划再写一部纯粹的爱情小说，已经写了一部分。人到中年，再看那段生命的记忆，一代人情感的表达，历史的体验，有着很多不同。当下爱情小说也难写，我曾和一个编辑聊天，他感慨地说，爱情小说快绝种了，现在的小说家，越来越不会写爱情了。因为爱情小说是朴素的，对作者的心性和表达都有很高要求，放纵了情感，就成了伤感的矫情，放纵了欲望，就成了当下流行的另一种俗烂套路，特别是当下，女性阅读和男性阅读，对情感小说的诉求差别很大，一个男作家要真的将爱情写得真实可信，故事好看，又感人肺腑，非常不容易，我愿意尝试一下。对于历史创作领域，我也有一些打算，不知有没有时间，就慢慢来吧！

**李黎：**《王小波传》的写作动因是什么？不可否认，王小波是一代人

的精神偶像，对太多的写作者影响深远，但同时，随着他离世时间的久远以及越来越多的热闹的现实或者网络虚拟生活，他的影响力在下降，起码他的生日忌日，都从热门事件成为了寻常纪念。这是意味着王小波的“过时”，还是真正进入常态？王小波对你意味着什么？

**房伟：**王小波是我走出人生困境的重要精神资源。可以说，没有王小波，我在车间工作那几年很难支撑下去。我在最艰苦、最困难的那几年，就是靠着阅读王小波，让自己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的。王小波也是我在文学创作上的启蒙者之一，对我的影响很深。当然，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王小波传》不是一部“粉丝传记”，我希望从严谨的学术理性出发，以丰富的考证和严肃的书写态度，为中国文学和读者们提供理性思考的参照。我对盲目夸大王小波，树立王小波与文坛对立的作法，也是不赞同的。然而，王小波是一个了不起的、重要的作家，也是70后、80后两代人的精神偶像，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他的重要性，在于填补了中国文学表现形态的空白，在思想内涵和表现技法上，都有着卓越表现，而现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王小波的重要性，也是估计不足的。这有待于更多学者专家的研究。我想王小波永远不会过时，成为常态也是正常的。当然，就创作上而言，我走的路子和王小波是不同的，但我会一直保持对他的敬意和尊重。

**李黎：**再往前若干年，你似乎从事过很多的文字工作，甚至包括主编培训教材之类的。那些经历除了赚钱本身外，还有什么收获？

**房伟：**我大学毕业后，最早在企业干过五年，干过工人、统计、保管、秘书等很多职业，当时也在几个企业干过，有肉食品加工厂、农业公司、建材公司等几个单位，接触过很多杂七杂八的知识。那时我不仅干文字工作，也有体力工作，有着很多艰辛的体验。我给领导写材料、写新闻通讯稿子、写企业管理类论文。我那时还在几家报社当兼职记者，还写过不少时评和杂文，以及系列社会新闻稿件，比如地下摇滚、贫困救助之类的，有些反响不错，还获得过《王小波传》《风景的诱惑》等6部，另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曾获茅盾文学奖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叶圣陶文学奖等。



李黎

1980年生于南京郊区，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拆迁人》《水浒群星闪耀时》。



房伟

男，1976年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在《收获》《当代》《十月》等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数十篇，有学术著作《王小波传》《风景的诱惑》等6部，另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曾获茅盾文学奖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叶圣陶文学奖等。